

第一部

世纪之旅

谭元亨 著

字家魂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00112

I247.5
887

第一部

谭元亨 著

客家魂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世纪之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魂三部曲/谭元亨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7

ISBN 7-5302-0470-X

I. 客…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181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客家魂 (第一、二、三部)

KE JIA HUN

谭元亨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375 印张 1 455 000 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02-0470-X
I·476 定价:80.00 元

“高举骨头”：史识与诗情

——自序

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像这么一部一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就如同一次生命的燃烧，一次漫长的、不断发出白炽光焰的燃烧。它有可能把生命燃尽，以至一位早夭的作家在完成一部力作后把笔一掷，称：“我可以死了！”果然在那之后他便溘然长逝了。

但它应该让生命扬起更猛烈、更璀璨的火焰，因为它可以凭此更坦然地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面对历史，可以无愧于养育它的父老乡亲以及整个民族与国家。所以，当我搁下笔，我想说的是：我可以活得更好、更坚强了！因为我已经用我的作品，向一切横逆、暴戾与非人性的东西，勇敢地挑起了战书。

对于以笔为生，以笔为帜的作家来说，也许这是两种人生态度？

前者，可能是一种自负，认为自己足以传世，因为自己已竭尽了全力。

但我身上奔涌的客家人的血液，却教我记取后面一种人生之路：不断开拓，不断进取，决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弯曲笔直的腰杆。刚结束了《客家魂》的写作，一部《客家圣典》的大纲便在笔端倾泻出来。它是融哲理、诗情、史识于一体的一部

0044/05
长篇新作。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它会写成什么样，如同我十年前不知道《客家魂》会写成现在这样一样。它的写作，将是一次生命更猛烈的燃烧，将闪耀出更白炽的光芒……

无疑，在一部长篇作品中，包容着作家及其所在的民系、民族的一部分生命。只有把生命投入进去，作品才会有它的生命力。这里面，有我的血肉，有我的眼泪，有我全部的良知，也有我客家母亲的生命——她是在我写作这部作品时去世的。她曾给我抄写过上百万字的文稿，但未能抄写这一部直接与她有血肉关联的作品。从动笔起，她的生命一直处于垂危中，苦撑了几年，却未能等我最后完稿，这是我终身之憾。当然，这部作品里面，更有众多客家先贤们的生命……

正因为这样，我无法遏止我的激情，从写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乃至完成之后。我不是那类很冷静的作家——虽然我也写过若干相当冷静的作品，曾赢得国内外的一致赞誉。有人企望我能那样写下去。可我做不到。包括在课堂上，人家都能端上一杯清茶，娓娓而谈，而我却像一次演说，两节课下来，满头大汗，一身虚脱。但学生喜欢听我的课，每每激情迸发，他们便能记下许多精辟、深刻的句子。我事后翻阅，连自己也觉诧异——的确，激情每每能激发灵感，激发智慧，平日没有思考到的，此时却一下子冒了出来。写作也一样，没有这不可销蚀的激情，你就不可能有生花妙笔。激情便是生命，便是生命的升华，一个作家没有激情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它可以深深埋在心底透过冷静的追述表现出来。激情也就是生命的燃烧，生命不熊熊燃烧起来，那就没有火，没有光，也就不成为其生命。燃烧才是生命，激情才是生命！

客家民系同样是一个火一般燃烧的民系，一个有着蓬勃生命力的民系，描写他们，不能不用火一般的思想，火一般的语言，火一般的激情……

于是，诗的迷狂，主宰了这么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

但对于一部如此之长的历史之作，仅仅有诗的迷狂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清醒的史识。要为历史要为今天，留一个清晰的脚印。作者需要站在一个不可企及的历史高度，去俯瞰自己的作品，从而确定它在历史长河中应有的位置。

因此，史识与诗情，均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种俯瞰中，我产生了这部长篇的几个副产品——若干关于客家学的理论文章。

众所周知，客家人又被称之为“中国的犹太人”，彼此之间，浪迹天涯、尊重教化等特征十分相似：犹太人与客家人在这世界上均有千年大迁徙的历史，此其一；犹太人被称之为“书本的民族”，而客家人的腹地则有“人文秀区”之称，此其二；还有其三、其四，不一而足。而今，犹太文学已是世界文学中的佼佼者。那么，客家文学呢？当然，在中国也是出类拔萃的，黄遵宪、郭沫若、黄药眠等等。

这些年来，我接待过日本、欧洲的不少作家、文化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客家题材产生浓烈的兴趣，文学与影视都将推出不少。……这是令人欣慰的。

文学的产生需要冲突，当观念与感情面临巨大的历史变革之际，是会发生众多戏剧性的冲突，世界之所以看好客家人这个题材，正是意识到：大规模的迁徙本身就包含一种文化的变迁，内陆古老传统的负载者——也就是客家人，经千年迁徙，万

里长旋之后，抵达了欧风日渐的中国本土的东南沿海地带，将如何融入现代文明之中？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人类学、文化学的命题。传统在剥离旧体、价值观在嬗变……而这便带来了一连串的客家式的主题：

宿命与使命；

主客意识与边缘地位；

义利之辨与自我本质的蜕变；

特立独行与融合认同；

归真返朴与异化；

贵族观念与平民思想；

.....

而这些主题，无论在当代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都具有相当广泛与深刻的意义。于是，我的理论探索便开始了，先后发表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断裂与华夏文明的维系——世界民族大迁徙中客家先民南渐新论》、《主客意识与义利之辨——客家文化与犹太文化差异的历史透视》等等论文，并在海内外产生重大的反响，有的被转载了十次之多。

当然，这需要一种清醒，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清醒，也就是史识。清醒也便是史识。

这里所说的史识，不是我们既往从教科书中得到的，也不是从已有的传统典籍中得到的，而是需要自己的独特的俯瞰历史的目光。

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在某些新时期颇有影响的鸿篇巨制中，我们得到的却是业已改头换面，但骨子里却是腐朽不堪的诸如“循环论”、“气数观”之类的历史陈腐之见；或者是用某种僵化的政治观念图解历史，从而留下太大的遗憾。这里就不

多说了。

《客家魂》至少是用一种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了千年——百年——十年的历史。它的架构：千年景深——百年展示——十年聚焦。这同样是一种历史观的诠释，尤其是对二十世纪史的重新审视。作者要打通发生在这个世纪的所有历史事件，并且用客家人的目光，尤其是重教化的目光，去看待这一百年的云舒云卷，潮起潮落，把它置于理性的天平上。我希望，人们通过它，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中国的二十世纪，重新认识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你与我。

这里捎带一笔的是，在《客家魂》写作过程中，我同时完成了一部三十万言的历史哲学专著《中国文化史观》——我以为，这可以算是对《客家魂》的新史识的一个阐释，虽然它不是文学作品。

清醒的史识加诗意的迷狂，对于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历史长篇小说是“睛”与“魂”的关系，前者是史，后者是诗，失去任何一方，也就不成为史诗了。我不讳言这部作品对史诗的追求。所以，它不仅仅是史，也不仅仅是诗，二者的融合，激扬起的是哲理，是理想，是人类永不竭尽的伟岸的精神。所谓“识”不仅是对既往彻底的透视，也同样是对未来的瞩望，“识”，是对历史的人性深刻的见地，因此它就能昭示人类的未来。《客家魂》中的玉祠、双渔、元戎，正是对历史与未来（当然包括现实）有过人的“识”，才对教育事业如此执著。正是清醒，才拥有执著的迷狂，才谱写出这么一部史诗！

客家人在精神上是高贵的。他们从一降生起，就受到这种贵族精神的熏陶，他们认准自己祖上出身是高贵的，是当年的

衣冠士族，以郡望而自矜，再落魄，也能津津乐道祖上的功德与名望，真可谓“心比天高，身比纸薄”。他们千辛万苦，百口余一，挣扎到了南方，后到为“客”，只余下残山剩水供他们休养生息，被土籍蔑视为“獠”，从而彻底地平民化了。台湾的客籍作家钟理和在 他的名著《原乡人》中描写过客家人不得不从事社会上最下贱的职业的可悲情景——于是，意识与行为造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便产生了前边提及的贵族意识与平民思想冲突的主题。

剖析这个主题，我没有再写一篇论文，却以二十五万字的一部评传《邓演达》来回答的。正是这么个历史人物，力主农民运动，却又把农民起义称之为“流寇主义”；在北伐战争的关键时刻，已在武汉方面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的他，当率军力挽狂澜，却一口回绝郭沫若“我刚刚把老虎皮脱掉，又要让披上吗？”……惟有以他身上贵族意识与平民思想相互冲突而又统一于一体才能作出解释。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已无法苛求，对于本书中的玉祠也是一样。他们属于一个“精神贵族”的群落，无论他们处于怎样低下的地位、面临怎样的凌辱，其精神仍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高贵的秉性，这是郑家士、日军及其他人不理解玉祠之处，也是李雪君、吉步高等无法战胜元戎、萱龄的地方，更是支撑启兴在被毁容之后尚能原宥石萝而超然的解释。坦率地说，有时，包括我本人，对客家人的那种特立卓行、顽固至病态的执著每产生疑惑：他们为自身的清高实在是付出太高的代价，这值得吗？这世界莫非只有他们才如此清醒，而别人一律昏庸吗？连托尔斯泰都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力图证明大人物“是历史无意识的工具”，“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无意识的、普遍的、

随大流的生活……”现实的人永远如雾中行走，他以为看得很清楚的，也顶多是前面几十米远的地方……而客家人高傲的精神，则永远可以保证未来有可能的许诺吗？他们如此重文化、重教育，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情感失血、灵魂出窍的碌碌尘世中，又能起到多少振聋发聩的作用呢？

——这也是我对这部长篇写作意义的疑惑。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贵族”的意识仍在我身上起作用，毕竟我身上也奔流着客家人的血液。所以，我才不顾自身的疑惑以及周围人不解的目光乃至嘲讽，以及喧嚣的商潮与下海热，乃至孔方兄与乌纱帽的诱惑，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十年间把它完成了。

也许，它只是给我一个证明：人，是否能在红尘滚滚、声色犬马中尚能把持住自己，为了一个业已确定的目标——无论大或小，矢志不移地给人世留下点痕迹，而不“随大流”淹没了自己——那耸如华表的石笔，不正是这种贵族精神的象征吗？

同样，这也是客家人留给历史的痕迹。

十多年前，有人曾把我的创作风格称之为“神秘的东方色彩与象征主义”，以区别于魔幻、结构现实主义等等。但后来，连迷信也被正名为“东方神秘主义”了，这一手法也就不复有人提起。

而我这里又以一对石笔，以象征一种人文精神、一种理想主义、一个价值取向的不倒。同时，也赋予其神秘的东方色彩——一对板车的车柄、长成叩上去作铿锵之声的石笔树！

无疑，在中国南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插上一支拐杖，是足以长出一片茂林的，更何况是一部板车，更何况有玉祠的血

肉之躯作滋润呢——这不是神话。

然而，就象征而言，《客家魂》不独有这石笔树，象征本身，也不独是某某物，而可以是整个的艺术氛围，整个的主、客观环境……作为文学作品，形象，乃至意象的模糊性，多义性，恰巧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提供了审美的真正标准。在《客家魂》中，无论是郭家祖居所在的“潭坑”，还是元戎奄奄一息躺在的“鬼寮”，无疑都具有其象征意蕴的。

进而言之，启兴被发放到的火药工厂，乃至那被肢解的大学校园，用今天或未来的目光看，那只能是一个个寓言世界。它的荒诞，在火药工厂是显性的——正常人反而自惭形秽，而畸形人却一个个志得意满，认为自己浑身的残肢写满的是“光荣”；但大学校园的寓言意味却是隐性的——过几十年后回头再看，一个教育的圣地，为何竟会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小小的出租车公司竟可以凌驾在大学之上？

未来所摄取的目光，会认为我们今天生存在一个寓言世界里。除此之外，别无解释。一部作品，能有什么办法去同“此在”的非人性、非理性去协调？除非把自己也当作一个寓言。因为在寓言中，任何逻辑上火水不相容的东西也就能共生在笔端了。荒诞也就不成为荒诞，诸如呆在上游的狼谴责在下游的羊弄脏了它的水，并以此定罪一样。

所以说，这部一百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无非也是个寓言。

但愿能理解作者的苦心，不去寻究季湘为何倏忽消失在山巅而出现了个老僧，也不去寻觅黄先璜是否那位神秘老人，而后一代的启兴又重蹈其覆辙，更不用去研究客家人为何自古以来都有勘舆的祖传之秘——客家人，从其一诞生起，他们不就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偌大的寓言世界之中而左冲右突，不得不去

寻求一种非人性、非理性的协调吗？

但他们仍执著于教育，力图凭人类的理性来改造这个寓言世界，使它尽可能地合理一点、合乎人性一点。

这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也是他们的伟大所在。只有这种千年的执著，才可能面对世界的种种不测、丑陋与罪孽而不动容，不改变，虽九死而未悔。

他们流浪，他们寻觅，他们追求，他们义无反顾地献身，谱写了我们民族一曲又一曲文明与愚昧相搏击的悲歌，他们深信自己的理想境界是可以达到的，哪怕在万里长旋的征途上，铺满了玉祠、南飞、纯之、双渔，及至元戎、余恬、萱龄们的尸骨。

把祖上的尸骨洗净，背在业已佝偻的背上，再一次远征。

人们将永远记住，我们的总书记、那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胡耀邦，在当年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发自肺腑叫出的口号：

——高举骨头！

因为他是客家人，也只有客家人，才会叫出这样的口号。

只有客家人，才能深深品味这个口号中历史的悲凉以及人格的意蕴。

洗骨迁葬，有谁道得尽客家人这一传统仪式中所寄寓的意义呢？同样，又有谁道得尽胡耀邦“高举骨头”对这一仪式所赋予的历史与时代的深意呢？

小时候，我作为湘潭最优秀的少先队员，曾给当时担任地委书记的耀邦同志献过红领巾，这童年的一幕是永远难以忘怀的。那是一条绸子做的红领巾，个子小，怎么也不能为这位团中央书记系好，而他已经把头弯得够久的了，却仍不住地宽慰我：莫急，会系好的……

其时，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是因为“右倾”而

被贬至湘潭的。后来，我这“最优秀”的却成了“文革”中被地市革委会成立时惟一点名的“最反动”的右派学生，押送到了酃县当知青，也就是客家人聚居的炎帝陵之侧的河西公社——那时还是湘潭地区的范围，因此，后来炎帝陵的碑文，又是耀邦同志所写。正是在那里，我动笔写了一部关于教育的长篇《山花烂漫》。而后的一切，国人们也就皆知了，由此改编的湘剧让我成了剧团的编剧，却又遭到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而打下十八层地狱……三中全会后，周扬同志亲自过问，自然也惊动了秘书长胡耀邦同志，我才走出了冤狱。

不说后来的官司了……提笔写此文时，正是4月15日，我悚地一惊，是耀邦同志7周年的忌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在纪念他？他身后的寂寞绝非正常，在这里我只想说的是，正是在他猝然辞世后那些个黯淡的日子里，已打了十年腹稿、甚至已写出了部分章节的《客家魂》竟呼之欲出。几天之内，我完成了四万来字的全书的大纲，一百四十万字的构想就此成型了。是怎样一种哀思催生了这部巨著？全书一开始，主人公元戎也就在那里洗骨迁葬，“高举骨头”了。

可以说，耀邦同志那种嫉恶如仇的品格，哀悯众生的温情，以及好冲动、敢作敢为的个性，集中体现了作为整体客家人这个民系的性格，一千年也无法改变。

当一切都被剥夺之后，我们仍能“高举骨头”——千年之后，对于中国人又该是怎样的一个寓言？！

原谅我没有在这部苦苦追寻史诗品格的作品中写到我这位人生的引路人，虽然它几乎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写到或提及了。我只能在这序言中给他加上这么一笔，但愿他是这个世纪悲剧的最后注脚——当然，在这部长篇

小说中没有出现的他，却是真正的主人公。在杨双渔、在陈应彬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读”到他。

在不应有的身后寂寞中，谨以这部无声的著作来表示我无尽的怀念。

欲哭无泪。

我从年轻，写到中年——甚至是老年：不久前一次运动会上，我因超过45岁名列老人组；市里优秀中青年作家榜上，也同样给划出去了。生命，在这二十年间骤然变得如此短促与紧迫，很多事，本想以后慢慢做的，可兀地发现，竟要来不及做了。包括这部作品——因此，一旦动笔起来，几乎是一气呵成，每部之间的间隔竟不到一个月，而这个月之中，还须完成教学、科研等诸多工作。

生命在凝聚。

时间——历史也在凝聚。

人们不难看到三部的架构：千年景深——百年展示——十年聚焦，这是第一部；第二部，则以建国三十年与“文革”后的三年徬徨相映衬而铺陈；第三部，则在山区——大学——海外的空间上展开……无论从时间，还是在空间上，我都留下了很多的空白，在两条甚至三条的时间轴上，把历史与当代的事件，一同推向悲剧的峰巅。历史感与当代意识竟难解难分。历史是今天的注解或放大，今天则是历史的凝聚或缩影——这种时间观与空间观，第一部出来之际便被人称之为“显示出浓烈的民族特色——东方神秘主义与象征意蕴”，这又回到本文前面提及的创作手法来了。无疑，人们是可以从这样的架构中，“直接从两人、两事相隔数十年的经历中体察跨越巨大时空的历史纵深感”。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不是简单地模仿人家的创作手法——诸如马尔克斯、诸如索尔·贝类（我译过他的作品）的，而是在自己民族形式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创作手法。我不知道，通过这部作品，我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

穿上别人的衣装去赢得认同，也就取消了自己，中国文学也就无法独步于世界文坛上。虽然日本人如今也热衷于中国题材，甚至也有名作家在写客家人，但写出来，也只能是日本式而非中国气派的，与其别人误从他们那里认识客家人，不如我们自己先来完成——毕竟，客家人是中国人，客家人在世界赢得的声誉也就是中国的声誉。

也许，正是客家人这个跨越时空的存在，赋予了这部作品全新的、同样跨越时空的艺术构架。形式总是服从于内容的，这个结构，也只能源于这么个历史的存在。

我把这部作品交出去了，也就把生命的一部分——中年，连同若干青年与老年——交出去了。它是我的血肉之躯的一部分，诗情同样是血肉，是血的燃烧。

虽然有人对我说，文化人，尤其是作家，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营造一个“乌托邦”——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哪怕是批判性的作品也是如此，企冀在不测与无常中多一些理性，而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一来，只会增加内心的焦灼而过早把自己燃尽。

不过，我笔下已不再有“乌托邦”了，而燃烧——生命的燃烧，只要不是颓废主义者，也就不意味着燃尽，这又如我文前所言。

更何况一部新著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呢？

至于理想色彩——这也许是客家人所共有的，却并不等于

“乌托邦”，他们矢志不移、九死不悔所追求的，更非可望而不可即——何况他们执著的文化教育，正踏踏实实地垒筑起未来可见的文明之厦。因此，在他们的悲剧人生中永远闪耀着理想的亮色，也只有这样的亮色，才教这样一个民系的群体，在世界民族中显得如此出类拔萃，如此卓尔不群——当年，日寇闻知是客家人地方，马上就退避三舍，在上海淞沪之战中，他们可是闻风丧胆了。

在长达一千年的大迁徙中，在万里征途的风吼雷鸣中，他们为了维系这个民系的长盛不衰，为了守卫这个历史群落的文化边界，其惟一的武器，不就是“高举骨头”，用血肉之躯去换取正义、换取理想、垫起事业的基础，万难不屈，视死如归，才赢得这么一个美名，这么一份圣洁吗？

在当今理想主义似乎已经不再时兴，人格道德似乎也没什么热门，实用主义、媚俗等均以“现实主义”之名而粉墨登场之际，守住这样的一份真纯，不更显得可贵吗？

也为自己心灵保留下一片圣土。

似乎太累了。

总是很累。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苦命的，为了那么一个太过于执著的信念，不能不累。苦行僧、殉道者……已经有人加了不少这么些名号在我们的头上。

以至于累得这部长篇小说不能有个结尾。

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没有结尾的，它应该为阅读者拓展出一个阅读后无限的空间，一个比作品所已经描述过的更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客家魂》作为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教

育史乃至中国史，它的篇后展示的则应是二十一世纪及更以后的历史空间……

连元戎自己也在哀叹，他所能作出的努力，只是“形而下”的，为了争回学校的一片“失地”、为了尽可能多开几次现代讲座，为了出国归来以后洗雪身上的“嫌疑”……的确，这太等而下之了，并不是一个高等学府，一个产生崇高精神的高等学府所面临的“命题”。一所大学，它的要义、它的命题，也应当是“客家式”的，是形而上的，关于人文精神，关于现代意识，关于未来的一切；元戎应义无反顾投入的，该是全新的教育观、全新的思维方式，等等，而这，才是一位学者所企盼的、为此而殚精竭力在所不惜。

可现在却只能作堂·吉诃德与风车的搏斗。

这是他最深刻的悲剧，也与玉祠几乎不差上下的悲剧，几代人的悲剧。

他活得很累，却不值。

累得倒下了，差点死去了，实在是不忍，所以才让他活下来，希望他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面临全新的、真正“形而上”的高等学府的命题。

包括他的亲友们，余恬、双凫、萱龄，尤其是最后才出场的、让人揪心的问樵——我来不及、也不可能为他多着笔墨，因为他的历史舞台是下一个世纪。

他们应当有全新的生活。

因为他们，这部《客家魂》并没有结尾，它还要延续下去，借助于历史、借助于时代，更借助于读者的共同努力。

当读者惋惜元戎们把生命虚耗于非他才识所在的社会活动或斗争之中时，元戎们未来的生命也就得到了确认，《客家魂》